

前 言

当“社会性别学”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显学,许多基本概念已经广泛地流通在各个学科领域之时,“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学术界仍处边缘。渴望了解这一领域在国际学术界发展状况的青年学子,往往苦于无从寻觅相关理论书籍。由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1995年·北京)的推动,“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女权主义核心学术概念在中国各类妇女组织和活动中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许多具有学术背景的妇女活动分子有效地运用跨国女权主义运动中产生的各种理论方法,从各个方面进行改变中国社会性别等级制的工作,包括在高等院校开拓和发展妇女与社会性别课程。但是,十多年来,中国学界和妇女活动界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基本上是把它作为仅与“妇女”相关的概念。

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于1986年发表在主流学刊《美国史学评论》上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收入本集)一文,^[1]是女权主义学者拓展社会性别理论概念的一篇经典之作。在梳理学术理论状况时,她对“社会性别”一词当时在美国学界的情况做了如下分析:

[1] 我们获得《美国史学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允许,重新翻译这篇网上下载率一直名列前茅的学术论文。《美国史学评论》于2008年12月开辟专栏,讨论20多年来斯科特论文对国际学界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该论文的第一个中译版发表于译文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等主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

男性研究

“社会性别”一词最新、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在过去几年里,很多研究妇女史的书籍和文章都在题目中将“妇女”换成了“社会性别”。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替换虽然模糊地涉及了某种分析概念,但实际上是为了在这个领域的政治里更容易被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社会性别”是为了表示一部著述的学术严肃性,因为“社会性别”听上去比“妇女”更为中立、客观。“社会性别”似乎同社会科学的科学术语很相称,于是它把自身从(听上去刺耳的)女权主义政治中分离出来。在这种用法里,“社会性别”既不携带着关于不平等或权力的必要声明,也不去识别受到不公正对待(及迄今为止被历史遮蔽)的一方。鉴于“妇女史”这个术语强调(和惯常的实践不同)妇女也是被认可的历史主体,以此宣告了自己的政治性,而“社会性别”包括妇女,却不特指妇女,因此显得没有造成什么关键的威胁。“社会性别”的这种用法可以说是在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追求学术合法性的一个侧面。

斯科特对美国学术界20世纪80年代的分析,用于当代中国学术界也颇为贴切,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已经有大批学者投入生产种类繁多的关于“社会性别”的著述,而在21世纪的中国关于社会性别(包括仅把社会性别作为“妇女”的替换词)的学术研究,依然为数不多。需要强调的是,在过去20多年里,在国际学术界,社会性别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并且早已不是美国学者的专利品。世界各地都有学者从本国、本土文化的实践出发,积极参与了对该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种来自不同文化和学科背景的探索反过来也深刻地改变了国际人文社科领域的内涵。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新兴学术领域,社会性别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各个学科相互吸收、相互交融,并且往往是改造更新传统学科的关键驱动力。

为了拓宽中国学术界对“社会性别”的理解,我们选择了社会性别学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男性研究的一些学术成果,推荐给读者。相比于社会性别学的其他内容,“男性研究”在国内学界的知晓度和关注度更低,在此我们需要对这个学术领域出现的背景简单介绍。只有了解了一个学科或理论概念产生发展的特定背景,才可能比较深入地理解各篇译文的探讨目的和争辩要点,也才可能更进一步地考虑在本土文化的背景中运用和发展这些理论概念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同时,译介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还涉及棘手的翻译转达概念的问题,我们也将花费一些笔墨来探讨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历史时期语言的使用和翻译。这个讨论是为了提醒读者关注词语对社会性别概念发展的重要性,以便理解各篇文章的作者所努力揭示词语受具体时空限制的含义。这个讨论也是希望帮助读者对自己所习以为常的词语产生自省和反思,包括最日常的词语:“男性”、“女性”、“男子气”和“女性味”等。保持对文化现象被自然化的警觉和抵制是有效阅读本译文集的前提。

本译文集所推荐的著述运用的理论方法可能是国内学术界所不熟悉的,但是,作者所探讨的问题却并非与中国学界无关。19世纪中叶,西方学术被作为现代性的内容引进中国。时至今日,许多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西方理论概念,依然被很多人作为科学真理对待。社会性别学术对这些理论概念进行了颠覆性的审视与分析,近年来兴起的男性研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男性研究”对西方传统学术和文化现象的批判性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知识生产的时空具体性和权力关系,为我们提供丰富的分析工具,以展开对人文社科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学术理念的质疑和解构。要能从批判知识生产历史过程的角度去阅读本译文集,就需要我们细心体察作者们质询的态度背后的政治含义,并思考这些批评与我们自己所具有的知识构成的相关性。

一、男性研究与女权主义

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美国等地区蓬勃发展的女权主义运动、对妇

男性研究

女和社会性别进行的研究和理论化,与后来我们称之为“男性研究”的学术领域的兴起,是一个辩证的历史发展关系。在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很多男人意识到,性别歧视既伤害妇女也伤害男人。他们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女权主义实践和研究当中来。当时的女权主义活动家和研究者有两种立场。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性别压迫者,因此不认为男性参与的活动对女权主义有什么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是,更多的女权主义者却指出,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各种不平等(包括种族、性存在和阶级等)是一个交叉的、互相关联的体系,所以必须要联合有批判意识的男性,并且把社会性别议题和其他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很多女权主义研究很早就超越了僵化的“妇女”范畴,转而探讨“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女权主义的影响下出现了第一次进步的男性运动,力图通过批判父权制和男性至上,来推动个人和体制两个层面的社会性别权力变化。这是“男性研究”作为一个批判性研究领域产生的背景。

与进步男性运动平行展开的是对女权主义的敌视。这种敌视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男权反弹,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反弹的一个典型表述就是指责女权运动是造成美国社会和文化各种“危机”和问题的根源。这种反弹还表现在旨在恢复昔日社会性别秩序和重振大男子雄风的言论和活动的频繁出现。如美国流行心理学家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所著《铁汉约翰》(*Iron John*)一书,提倡所谓与“女性特征”截然不同的“男性特征”。该书成为1990年的畅销书,并非偶然。这类活动和这一社会思潮也被称为“男性运动”(Men's Movement),在大众媒体中广为传播。美国男人中这两种立场迥然不同的潮流在发展中有了各自的标识性名称:“男性运动”是一个争议色彩强烈的词汇,它指涉的是具有反女权立场的男人活动,也可被用作男权主义反扑的社会风潮的代名词,大部分倾向女权主义的男性学者和活动家,不把自己与“男性运动”或同类的所谓“男性解放”挂钩。“男性研究”领域则

继承了早年的进步男性运动的目标,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以及种族研究等批判性研究领域一起迅速发展,并在诸多理论层面对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男性研究”,指的是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框架中发展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始于把男人作为“具有社会性别的人”的研究,发展出主题多样、内容开放的学科领域。比如对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建构的考察,已进入社会、历史各个方面,包括研究男性特质如何在保障权力的各种机制中,发挥它在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层面的效力(见本书马里娜力尼·辛哈(Mrinalini Sinha)一文)。男性研究的突出贡献是,它帮助我们深入探讨社会性别一性的机制是如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角落运行,特别是当我们观察的对象是男性的集体和个人的时候,比如历史上只对男人开放的政治领域、军队、男性文化团体、男性社会交往圈、经济和金融活动等等。在这种“男性同性社交”(homosocial)的环境中,如果没有“女人”的直接参与,是不是社会性别就毫不相关了?还有,女人和女性特质(femininity)与男性至上的社会文化制度之间是如何互相依存和建构的?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把“男人”作为社会性别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来看待。男人的社会性别,是没有被标识出来的(如在国家颁布的政府权力机构人员名单中,仅对妇女作性别标识),正如在美国,白人的“种族身份”不用像黑人那样被标识出来一样,这背后蕴涵的权力关系和运作是需要深入探究的。不研究男人,并不是简单地“遗漏”了一些人群的问题,而是不能更彻底地解构社会性别权力体系的所有层面。

过去20多年里,国际学界对“男人”(men)、“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具体研究,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活跃地展开,已经出现了一大批有特点、有见地的学术著作。男性研究的学术期刊也在近十年当中出现了。这个领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本书将对“男性研究”领域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概念、分析视角和框架、方

男性研究

法等等进行一个概览,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较全面深刻地理解:社会性别和性存在在历史上、在现实中,如何深植于各种权力的框架之中,并且它们作为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的基本方式与其他如种族、阶级、年龄等差异范畴对权力的组织和表达方式有何异同、有何关联。男性研究的这些中心问题,和已经相当成熟并学科化了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所探究的议题相同。那么,“男性研究”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二、男性研究与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关系:权力(power)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问题

我们今天笼统地称为男性研究的这个领域,与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开拓性探索为男性研究学术发展提供了基础。斯科特的文章是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理论化努力的一个典型。她梳理了不同学科背景中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等级结构和主体性建构的分析,指出了那些主要学说的长短,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社会性别的理论定义。她的宗旨非常明确:把社会性别研究拓宽到对妇女及妇女传统领域的研究之外,来重新审视那些看似与妇女毫不相干的领域,如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认识,将社会性别建构过程(包括二元对立、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形成)作为历史学的主题,将其置于多种历史过程的复杂交错关系中来具体研究。不仅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组织权力的基本方式在运作,还要考察社会性别如何作为一种基本的指涉权力的象征性表达方式产生效应。本译文集选入的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响应了斯科特的呼吁。这些作者对男性特质的研究都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性别的建构,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一个不断录写和重写社会性别含义的过程。有意义的研究不能停留在讨论似乎定型不变的男人群体对女人群体的权力关系,而是要深刻地挖掘什么具体历史过程使得男人成为男人,使

得某些男人比其他男人更具有“男子气”，这样的社会性别制度到底在维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反过来又怎样在支撑某种社会性别制度？正如马里娜力尼·辛哈精辟地归纳的：“‘男性特质’只有在具体实践中获得含义，它没有必然的情境或起源。”〔1〕

那些力图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视角来分析“男人”以及对“男人”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与探讨，对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使女权主义者避免把男人看作无差别整体。一些女权主义者也很早就在关于种族和阶级的讨论中意识到：压迫者、被压迫者的二元区分太狭窄；男人与女人一样都生存于权力等级架构中，不同的男性群体也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各种权力关系。但同时，女权主义者对男性研究也有不少担忧和警惕，因为重新把男人放到研究的中心地位本身有可能不过是换了一个进步旗号，却继续采用男性中心的视角和框架。这样的担心并非杯弓蛇影。有不少男性研究的确非常强调男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忽视了男人对妇女的权力关系。

本译文集收入的论文中，很多理论思考都与这个问题相关：什么样的关于“男人”的研究是女权主义的、是真正具有批判性的、是避免了复制男权视角的、并且能更加复杂地看待“社会性别”作为基本分析范畴的？例如，托比·第兹(Toby Ditz)在回顾美国史研究中的“新”男性历史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在这些男性历史研究中权力关系的“缺失”：目前使用的分析范畴、分析框架以及被研究的题目（比如，某些特定人群）如何将妇女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问题边缘化？社会性别（特别是男人）身份构建、变化过程与大的历史过程——比如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等——之间的关联得不到学者足够的重视，这反映了哪些大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政治上的盲点？“（男人的）社会性别危机”这样的主题和假设折射出研究者什么样的认识误区？此外，杰夫·荷恩(Jeff Hearn)对“霸权男性特质”这一分

〔1〕 请参阅本文集所收辛哈的文章。

析范畴的质疑、康瑞文(R. W. Connell)^{〔1〕}与詹姆士·梅瑟施密特(James W. Messerschmidt)对这个概念的修正和辩护,其实都围绕着“社会性别权力关系”这个中心问题展开。

除了这些理论性的讨论,在有女权主义立场的具体研究中,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包括它与其他权力关系的互动、交叉)也是基本的、重要的关注点。本译文集收入了一个很好的文学批评研究个案,即依芙·萨芝维克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分析。她对一个虚构的空间中的能指、修辞所表达的情感和权力结构进行了剖析,给各个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社会性别权力建构的模式。而大卫·霍尔朴林(David Halperin)和依坂真纪(Maki Morinaga)^{〔2〕}对前现代语境中的性存在(sexuality)的考察,也是紧密地与社会性别、阶级结构联系的。他们在男性同性社交(homosocial)和同性情欲(homoerotic)的具体关系当中,分析权力等级(和阶级、年龄等级)。而印度殖民史学家马里娜力尼·辛哈则将对男性特质的考察置于殖民地时期英国殖民者与印度本土各族裔精英之间的互动中,揭示殖民遭遇本身如何既产生了英国精英殖民者的极度男性特质的语言表达,又产生了该语言表达的推论,即本土精英之间的“男人气”和“女人气”的区分,并提出了“殖民男性特质”的概念。她指出,“男性特质本身的含义源自具体的权力关系,男性特质的含义又被运用来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再生产这些权力关系”。

女权主义学者致力于发展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强调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与种族、国家、阶级等等范畴是纠缠在一起的。运用这个理论,很多男性研究不把男性特质局限在仅仅是同女性特质的对照中来审视。本书中盖儿·比德曼(Gail Bederman)和辛哈的文章就是如何在男

〔1〕 R. W. Connell(原中文译名康奈尔)现用名 Raewyn Connell,中文名康瑞文,现为女性。在本译文集收入的这些原作发表时,作者是男性。本译文集其他文章中提及康瑞文的原名,或用阳性人称代词“他”,以及参考书目中出现 R. W. Connell 的名字,我们一律遵照原文。

〔2〕 作者的名字现为 Maki Isaka,我们用的中文/日文翻译是她的现名。

性研究中运用交叉性的视角和方法的范例。比德曼对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美国社会中社会性别与种族身份的交融建构过程的精辟分析,与对当时的“文明”话语的批判性剖析结合起来,而这种很有力度的分析方法的有效性显然不会仅仅限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

男性研究领域不仅承袭,而且突出了社会性别研究对性存在的关注,因为性存在与社会性别权力密切相关。本书中收入的大部分文章都涉及了性存在的问题。比德曼和辛哈在某个具体历史研究中分析了性存在和社会性别、种族的关联。萨芝维克、霍尔朴林和依坂真纪的研究精彩地展示了,在历史上性存在与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最微妙的历史变化,常常被现代性话语笼罩之下的研究所忽视或误解。比如,霍尔朴林的古典研究成果显示,西方前现代体制中的同性情欲和性行为的分类,基本上与社会性别观念相关,而“性存在”的概念则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对于行为与社会地位的管理是由社会性别制度独立完成的;然而,“同性恋”(homosexuality)作为现代概念和范畴出现,则成为一个新的分类原则,把同性的性对象选择作为决定着性差异与社会差异的首要原则。作者指出:“同性恋”是一个新的性存在制度的一部分,“它为每一个人指派一种性倾向和性身份”。这样,它将新的元素引入社会组织、人类差异的社会表达和欲望的社会生产中,最终,将此新元素引入“自我”的社会建构中。霍尔朴林的探讨以及依坂真纪对日本江户时代歌舞伎的研究里另一重要阐述是:对同性情欲的接纳,并不意味着权力上的平等,它很可能是构成某种阶级和社会性别权力等级的重要因素。

最后,男性研究对女权主义学术的继承还表现在该领域对学术与政治变革关系的关注。本译文集收录的荷恩的文章最鲜明地表达了这一立场。他指出,男性批判研究“需要对知识的社会基础——包括国家的、地区的和文化的情境对知识的影响——有强烈的自觉”、有强烈的自我反思。他把男性批判研究自身放在与霸权相关的位置上看待,提出很多尖锐的问题,诸如“如何深刻地研究男人,才能抵制霸权以及抵制霸权性的

男性研究

定义和势力？男性批判研究如何挑战或难以挑战霸权？男性批判研究当中的女权主义和女权主义同情在哪里？在男性批判研究中参考了和运用了哪些女权主义？什么样的女权主义未被参考和运用？这些研究是否产生改造的作用？理论、实践和政治的关系是什么？这些研究占据着什么样的思想、道德和哲学空间？”（回顾历史，类似的问题也曾经无数次地、并仍然被各族裔的女权主义学者针对妇女和社会性别学提出。）这些既是实际的政治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康瑞文和梅瑟施密特甚至试探性地提出一个乐观的想法——即，也许有可能在男人之间建立一种“倾向男女平等的男性特质形态”，使它成为一种积极意义的“霸权”。这一提议，也又一次地引起学者们针对某些理论分析范畴的争论。这些思考和讨论清晰地告诉我们，男性研究领域作为女权主义学术的一部分，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活力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知识场域。

下面，我们结合介绍本译集中的文章，概要梳理一下有关这个领域中关键的学术和政治问题。

三、术语的问题：使用、解释与翻译

作为研究者，用什么语言写作和讨论，其学术和政治意义远远超过“语言”层面。术语的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分析范畴和理论概念）在当前全球化了的社会性别学领域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术语在起源地的历史，反映着那个地方社会性别政治斗争的历史；术语的翻译和传播，是知识、认识论，以及它们后面的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及权力关系的翻译和传播过程；术语的翻译和传播，对社会性别有复杂关联的话语场域会产生影响；恰恰是术语在翻译和传播中的困难和挣扎，反映其含义的时空具体性及其效应的不确定性。由于今天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包括性存在研究和男性研究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规模的、有相当体制支持的发展是从现代西方开始的，我们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和介绍，不可避免地

要使用外来的术语,而针对陌生术语的讨论,常常是新的理论认识发起的源头。

在男性研究这样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领域,学者们一直围绕着分析术语的问题展开着激烈的、意义深远的争论。作为这类学术辩论的一个例子,本文集收入一组关于“霸权男性特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讨论的文章。这一组文章,以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瑞文的著作《男性特质》(*Masculinities*)开始。在这里,康瑞文第一次完整、清晰地阐述了“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此后,学者们围绕这个概念有很多理论和具体研究方面的探讨;针对这些探讨,康瑞文在2005年与学者梅瑟施密特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来回答批评并对这一概念提出修正。另外,荷恩在他的文章中,提醒我们思考“霸权男性特质”与“男人的霸权”(the hegemony of men)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托比·第兹在美国男性史学研究回顾的文章中,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和政治的角度,讨论了包括这个概念在内的男性研究领域的理论和方法中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误区和危险。

介绍这一组讨论,我们主要有两个目的:(1)“男性特质”这个概念/分析范畴在目前英语世界的男性研究领域非常重要,产生了一大批关于社会性别与种族/族裔、阶级和性存在的交叉研究,使得对社会性别和性存在的研究能够围绕着男人当中的“权力”这一关键问题进行。对这个概念的关注是怎么来的?有哪些理论和具体研究的基础与背景?这种理论概念的讨论使得什么样的研究和实践成为可能?这一组文章清楚地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我们相信这些文章能帮助读者对这个新兴领域的知识生产历史有个初步的了解,并思考哪些理论方法可以有效地运用于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2)这个概念和分析范畴的出现和使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英语世界男性研究作为一个领域,与各种社会性别话语和社会性别权力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学者们围绕它的争论,也反映着社会性别研究和多种社会批评、运动当中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这些争论于是成为我们了解“术语”的重要意义的绝好例子。

本译文集收入了美国现代史学家盖儿·比德曼关于美国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种族关系的历史著作《男人气质与“文明”》(*Manliness & Civilization*)中的一章,^[1]作为一个实例来说明词语变化背后的深刻历史含义。比德曼详细回顾了在美国历史上几个与“男人”有关的概念/词语的含义变化。(这里我们保留她所分析的这几个概念的英文原文,以便读者理解她的阐述。)她追溯了在世纪之交的美国,manliness(男人气质)和 masculinity(男性特质)两个词汇的含义和关系,指出了这两个词汇所表达的不同的社会性别、阶级和种族关系。人们通常把“manly”和“masculine”两个词语当成同义词换着使用,其实这两个词在 19 世纪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她发现,“manliness”在当时主流话语中被定义为:“作为一个男人应具有的高尚品格和行为”。它包含着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崇尚的男性所具备的一切高尚的和有道德的特征。很多历史学家都提出当时的 manliness 指代“维多利亚式关于男人身份(manhood)的理想”——比如,性自律、意志坚强、高尚的品格。所以,19 世纪晚期,由于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对理想男人的定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manliness”所表达的社会性别理想也就动摇了。比德曼的研究显示,世纪之交的科学(包括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话语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基督教话语互相建构,其中产生的对“种族差别”的定义直接影响了对“masculine/masculinity”(男性化的/男性特质)的定义。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应对来自于工人阶级男性、黑人男性和移民男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挑战,需要一个比“manliness”(男人气质)内容更广,而且被社会科学和医学本质化了的新词汇来表达他们在性别和种族(以及阶级)方面的优越。此后,中产阶级白人男性希望动用一种不同形式的男性权力来定义白种优越、遮蔽阶级矛盾的时候,他们就日益频繁地使用像“masculine”(男性化的)和“masculinity”(男性特质)这样的词语。

[1] 该书英文全名:*Manliness &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作者通过这样的话语分析、对语言的历史研究来展开政治、文化、社会和宗教各个层面的思考,读者则得以通过“masculinity”(男性特质)、“manliness”(男人气质)和“manhood”(男人身份)这三个词来更深刻地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一节。这篇文章也促使我们思考:我们今天对这些英文词汇的翻译,如何能更贴切地体现英语世界女权主义史学家对它们所做的历史探讨?很多外文词汇进入我们的学术语言的时候,需要我们创造词汇来翻译。虽然“没有透明的、对等的翻译”已经是一个共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较合适的语汇来完成这个任务。华裔学者史书美在一篇讨论“女权主义”的含义与中西女权主义学者对话的文章中指出:“造成差异之不可调和的,不是本质的或者绝对的差异,而是无知。”^{〔1〕}作为译介者,我们希望尽量用贴切的汉语来翻译英语概念,不仅转达这些外来语汇在今天的用法,也说明它们的含义在其本土历史上的变化。读者对外来词来龙去脉的把握,是消除概念上认识差异的前提。同时,我们希望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我们所选用的汉语对应词也都有自己的具体历史。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详述。在此我们想强调的是:鉴于男性研究领域在中国还很年轻,它的很多术语的翻译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读者、译者都能对概念性词汇翻译的复杂性有高度的认识,以减少对这个翻译过来的领域的误读和滥用。同时,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在阅读中共同提高翻译的准确性,在翻译中加深对舶来学术的理解,并提出我们自己的批评。

目前,国内的论文和学术出版物基本上把“masculinity”翻译为“男性气质”,把“manliness”翻译成“男子气概”或“大丈夫气”。而“manhood”没有什么常用的普遍译法。显然,这是在中国历史相关研究缺位的情况下,中译者基本无视原文的社会性别研究的来龙去脉,直接选择现代汉语的

〔1〕 “Incommensurability is thus the consequence not of difference made essential or absolute, but of ignorance.”原文:“Towards an Ethics of Transnational Encounter, or ‘When’ Does a ‘Chinese’ Woman Become a ‘Feminist’?” in *Differences: A Journal of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13. 2(2002), 97.

词汇,简单对应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这些英文词汇。举例而言,目前在国内外出版的、最有影响的男性研究著作,当属康瑞文的《Masculinities》,中文译为《男性气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但如果我们如果了解到欧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成果——比如上文提到的盖儿·比德曼的文章——就会意识到,上述三个词语的汉语翻译需要在相互对照中进行,要能有区别地表达它们在英语历史语境中的关联和差异,只有如此,我们的翻译才不至于抹去这些词语所反映的欧美社会性别政治的历史演变。

康瑞文是社会学家。在这本著作中,她努力把“masculinity”作为一个有它自己的历史的词汇加以关注。她认为“masculinity”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和相关的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情境下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质疑这个概念的普遍性。康瑞文还提醒我们必须思考:“masculinity本身作为一个文化性很强的概念,是否在欧洲—北美文化之外有任何意义?”她指出,由于“masculinity”这一概念“有其内在的关系性”,并且只能与“femininity”对应存在,如果一个文化并不把女人和男人当成两极对立性质特征的携带者,那么(至少在原则上)这个文化就没有像现代欧洲—北美文化中的那种“masculinity”的概念。^[1] 康瑞文对词汇具有时空具体性的认识,其实这是女权主义社会性别史学家的研究早已关注的问题。对“masculinity/femininity”(男性特质/女性特质)这样的分析范畴的使用,目的正在于深入探究对塑造了当今主导性的社会性别观念的现代科学、文化、政治、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和运作的历史过程,从而揭示而不是复制霸权的学术和政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看待和使用社会性别研究的范畴,是“重写历史”的一个突破点和契机。今日的许多历史研究,在横向的层面上,把社会性别看作权力体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在纵向的层面上,通过社会性别话语和实践更深入地思考东—西、古—今的关系,以及(特别是)历史研究者本人作为一个历史的产物和历史的创

[1]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68.

造者、在什么话语场域里制造什么样的知识和权力关系。

从康瑞文对“男性特质”这一概念的使用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概念运用的复杂性的另一层面。虽然康瑞文提出了对这个词语/范畴的历史性的认识，但她在全书的分析中，仍然把“男性特质”这个概念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康瑞文强调，18世纪，在欧美逐渐出现了一个“使得现代意义上的男性特质产生和稳固下来的社会性别秩序”。^{〔1〕}但在描述早期北美时，康瑞文不仅使用了男性特质一词，而且标识出如“gentry masculinity”（绅士男性特质）之类的类型为“hegemonic masculinity”（霸权男性特质）。这时，她并未追问在“masculinity”这个词汇出现之前的时代与地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的是什么词语/概念呢？显然，康瑞文的历史回顾没有像比德曼那样能够密切关注词语的历史演变，她的阐述只使用了一个分析范畴：masculinity。

这个例子反映了当代研究者的两难：一方面，我们意识到语言就是社会性别历史的一部分，是流动变化的；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今天的理论背景中发展出有效的分析范畴和概念来，并用今天的分析概念去分析历史；而今天的分析概念又往往必须用有具体历史的语汇来表达。男性研究领域中的关键词“男性特质”就是这个棘手问题的具体体现。如何在有效使用今日的分析范畴的同时保持对词语历史演变的敏感性呢？本译文集中不少作者做了示范性的探索。比如，霍尔朴林虽然是个古典学者，讨论的也是前现代史的问题，但是他使用了男性特质这个范畴；依坂真纪分析的是前现代的日本情境，也用了这个范畴。他们的文章讨论了具体历史和文化情境下的社会性别形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以及社会性别与性存在、年龄和阶级这些范畴之间关系。虽然在分析框架上他们使用了“男性特质”和“同性恋”这样于彼时彼处不存在的范畴，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古代的某些具体称谓、身份及其反映的权力制度体系的敏锐洞察和分析

〔1〕 R.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 189.

深度。如霍尔朴林指出，“homosexuality”（同性恋）这个词是现代的创造（它出现在19世纪末），它在古代的前身至少有四个概念/范畴，它们和“同性恋”的意义涵盖内容是不同的，而那丰富的历史差异被现代科学和现代性话语抹去，以至于现代西方人往往只能透过“同性恋”这个概念去理解历史上男人之间的各种亲密关系。于是，“同性恋”吸收和连接了它出现之前的多种性话语传统，却在现代各种话语之中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超历史的、统一的存在。同样，“男性特质”作为一个现代词汇也有类似的“魔法”，上面提及的比德曼的研究已经展现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当这些词汇成为男性研究领域所使用的关键分析范畴时，它们又开始了在学术界的独特历史旅程。这个历史也应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这几个外来词语在中国的历史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此对这几个词的翻译历史做一个初步调查。1916年，中国海关总署在上海出版了一部英汉词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中文名《官话》）。^{〔1〕} 以下是与本译文集相关的一些词语在当时的翻译。（在这部词典中，femininity 和 masculinity 尚未被收入，这也可作为对比德曼研究发现的一个验证。）

Feminine: 妇女样式的, 婆婆妈妈的, 妇女的, 属于女流的, 类乎妇女的, 像女的, 阴属

Manly: 有男子气的, 有好汉的样子, 像丈夫, 有男子性质

Masculine: 阳, 男子的, 公, 牡, 雄, 阳类的, 阳属的, (语法) 公生类(新)

Manhood: 成人的身份, 人格

〔1〕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官话)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by K. Hemeling, Ph. D., Commissioner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Based on the Dictionary of the late G. C. Stent, published 1905 by the Maritime Custom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Womanhood: 女人的身份, 妇道, 女格(新)

编者在前言中指出,英文词汇的含义的中文翻译表达试图体现中国的情境。^{〔1〕}但显然,词语翻译带进了英语世界当时主流的社会性别观念和语言。比如“manhood”和“womanhood”的翻译。“成人身份”和“人格”仅用于男人;而女人则不能与没有性别标识的“人”相连,这是西方男权文化表达权力的一个重要象征符号。在“feminine”和“masculine”这对对应词的翻译中,有趣的是对前者的定义用了“婆婆妈妈儿的”这样的贬义词,而对后者却未附加价值评判词语,显然这个英文词的词义从“manly”的转换尚未完成。“Womanhood”的翻译既沿用了汉语中的“妇道”又创造了“女人的身份”这个新词语,相当贴切地反映了当时处于中西碰撞初期的中国,多种社会性别话语并存的状况。“女格”是一个新出现的词语,不知何故未能流传下来。^{〔2〕}

在这部出版于1916年的英汉词典中“sex”一词的翻译颇耐人寻味: Sex, 类, 造, 性, 属。在这四个总的定义性翻译之后,又说明该词若用于按生物学分类的鸟、花、昆虫、哺乳动物则需分别用一系列中文对应词:公母、牡牝、雄雌、阳阴。用于人类则为男女、乾坤、男女特性。今日中国人早就习以为常的翻译“性别”一词在彼时尚未出现,而这也是西方生物学科引入中国的初期。可见,当时国人对西方生物学中以性器官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生物决定论“sex”概念尚无确切的把握,所以仍沿用了“男女”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标识社会性别等级的词作为其对应词。即使有了“男女特性”这样的翻译,对“特性”二字的理解恐怕更接近对“类,造,性,属”的认识而非与性器官的联系。此刻,对“sex”含义的不确定和“性”这个汉字含义的不稳定还表现该词典对“female sex”和“male sex”的不同翻译

〔1〕 “Preface”(前言),页 ii。

〔2〕 该词典前言中说明:“现代词汇用(新)标出,但也大部分是从旧中文和日文中而来。它们中很多在口语中已经广泛使用。”见《官话·前言》,页 i。

上。当这两个词出现在“sex”词条下时,分别被译为“女性”、“女造”和“男性”、“男类”、“男造”。而这两个英文词分别出现在“female”和“male”词条下时,“female sex”和“male sex”则被译为“女流”、“女造”和“男流”、“男类”、“男造”。显然,对词典的编撰者而言,“性”与“男女”的连缀仍嫌生疏。

让我们对照一下 1930 年出版的《英汉模范词典》(*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1] 这本词典收入了 femininity 和 masculinity,其他几个词的中文翻译也发生了变化。

Feminine: 女性的, 妇女的; 阴属的

Femininity: 女性; 脂粉气

Manhood: 人格, 人性; 成人; 刚勇, 刚毅; 男子, 男丁

Manly: 如男子的, 有丈夫气的; 刚毅的, 勇敢的

Masculine: 男性的; 如男子的, 有丈夫气的, 粗鲁的; 刚毅的

Masculinity: 男性; 刚毅

Womanhood: 妇女身份, 妇道; 女流, 女界

Womanly: 宜于妇女的; 如妇女的, 有脂粉气的, 柔弱的

Sex: 性; 男女之别

the fair (gentle, softer, weaker) sex [美丽(温顺、较柔和、较软弱)的性], 女性, 妇女, —the sterner sex [更坚强的性]^[2], 男性, 男子。

比较两部词典, 时隔十几年, 中国有关性别的语汇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原先没有的“男性”“女性”“男性的”和“女性的”这些词语, 通过对西方

[1] 张世鑾、平海澜、厉志云、陆学焕编辑。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30。

[2] 此处为词典的英文用法举例, 方括号中的翻译为译者所加, 编者。

现代科学的翻译,在 20 世纪上半叶迅速成为中国基本的现代性别词汇。西方的生物学、心理学、性学和社会学中对男女二元对立、基于生物性的本质主义的认识,也依托着这对词语进入了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的生活、自我认识以及主体性的建构。就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社会性别与历史》(*Gender & History*)发表了学者乐怀璧(Leon Antonio Rocha)的新研究,“性:现代中国关于性爱与人性的话语”。这篇文章通过考察词典用法、学术及文化语言的变迁,分析了 20 世纪初悄然出现的“性/性爱/人一性的综合”这一认识以及相关新词语,指出在 20 世纪 10—20 年代,“性爱(sex)被植入、塞进、投入到‘性’(xing)这个汉字中,使得这个字的含义——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既指性爱又指人性的这个字(从而性爱即是人性)——得以自然化”。^[1]表面上看,“性”是不带有任何道德价值判断的生物学术语,是科学的、是“现代的”。但实际上,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通过对“性”这个汉字的转义以及新的语汇来创造了关于人的本质、性存在与社会性别的新“真理”和“历史事实”,对“人”的解放和“女性”的解放的讨论都与此类语汇的变迁紧密相关。

让我们回到前面 1930 年词典的例子上来。此时,男女不仅已经被“性”界定,而且被鲜明的社会性别语汇——“刚毅”、“坚强”和“脂粉气”、“软弱”来标记。至此,具有性征的身体和被分配、被描述的行为特征牢固地粘连在一起,被认为是自然的客观存在。“Masculine”一词的定义变化最明显,与“manly”的区别模糊了,甚至几乎重叠,显然,两个词语在英语语境中内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中文中对应词语含义的演变。在此,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比德曼对同一时期相关词语在美国的变化的描述:

[1] Leon Antonio Rocha, “Xing: The Discourse of Sex and Human Nature in Modern China,” *Gender & History* Vol. 22 No. 3 (Nov. 2010), 608. 这篇文章的历史分析,主要涉及性这个汉字如何被用来作为 sex 的译词,来表达性爱和性存在这两个含义,此文基本没有涉及“性别”作为 sex 的另一译词的问题。为了反映作者的原意和保持语言表达通顺,在讨论此文时我们只用“性爱”来翻译 sex。而本书中收入各篇文章的术语翻译将 sex 主要译作“性别”和“性爱”。

正当中产阶级男人们试图给男性的“品质和状态”增添一层层新的含义和权力的时候，“masculine”和“masculinity”这两个词语的含义被定义得越来越清晰。到1930年的时候，“masculinity”这个词已经发展成为包括更接近二十世纪美国人熟悉的“男性的”理想（“masculine” ideals）——比如咄咄逼人、身强力壮、男性的性行为——的混合体。^{〔1〕}

美国社会性别史研究使我们看到，英文和中文的社会性别语言都在变化，而中文的社会性别语言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的变化则镌刻着伴随着翻译同时舶来的社会性别观念——当然，这里的“翻译”不仅指上述英汉词典的重要翻译活动（以及其他语言如日语的参与），也指广泛的跨文化话语实践。

上面引用两部英汉词典的例子不算是严谨的历史分析。社会性别语汇作为社会性别话语实践的一个方面，它们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和跨文化流通需要我们运用大量的史料（至少包括中、英、日文的材料），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做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有所把握。但是这个小例子足以说明：第一，现代中国人所习以为常的许多关于性别的语汇是20世纪初才进入中国的外来语，包括“性别”一词。^{〔2〕}第二，这些外来语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新词汇，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西方世界体现、支撑其特定社会性别制度的社会性别观念。第三，这些早已成为现代中国人主体性构成部分的外来语，如“男性”、“女性”，嘲弄着任何文化本质主义的宣称。第四，了解当代学者对西方社会性别话语的历史分析和批判，不仅是为了理解西方社会性别的历史和现状，也是理解中国社会性别历史以及解析自我主体性建构历史的必要步骤。第五，鉴于每个社会性别词汇的具体历史含义，其翻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像“manhood”、

〔1〕 参照本译文集所收比德曼的著作。

〔2〕 在1929年版的《英汉模范字典》中“性别”作为对“sex”和“sexuality”的译词出现。

“manliness”和“masculinity”这些在当代研究中被用做社会性别分析范畴的词语,对它们的翻译要尽量准确地、清晰地反映出目前已有的批判性学术的研究和思考。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对这三个词语的翻译提出以下建议,并且我们在本译文集中统一采用下列译法:

Manhood: 男人身份

Manliness: 男人气质

Masculinity: 男性特质

“男人”和“男性”的区别使用,可以突出“masculinity”这个概念的现代性,即它被西方现代科学(尤其是性学、心理学和生物学)和文化高度本质化、普适化了。“身份”在语言上可以反映出,男人的生理特点使他有条件获得成年男子应取得的身份(当然,“成年”的定义因时因地不同)。“气质”作为一个通常有褒义暗示的词语,表现出“manliness”——“像男人一样”这个含义中所包含的社会性别优越感(以及经常与之相连的阶级优越感);同时,这个译词表达的社会和文化理想的意义,比较符合历史上“manliness”这一概念的用法。“特质”强调“masculinity”这个概念的本质化和普世化,以及它作为“femininity”(女性特质)的构成性他者这一特点。

其他一些词汇的翻译也是同样地复杂,我们在本译文集中使用的翻译往往是长期讨论的结果。比如,“sexuality”的翻译,一直是一个难题。目前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有各种各样的译法:性、性行为、性相、性存在,等等。在本译文集中我们采取了根据情境决定译法的办法。“Sexuality”含义的复杂性使我们不能用一个词语来翻译。语言本身的暧昧性,恰恰使它能够在实践中发挥非常灵活和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翻译也试图尽量体现这种暧昧性和多变性。在本译文集中我们主要使用“性存

在”来翻译“sexuality”这个词,但是根据具体情境,并斟酌作者英文使用特点,在适当地方也将它译为:性、性行为、性意识和性话语。

鉴于各学科青年学者英语阅读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在本集附录部分收入康瑞文的《男性特质》第三章的英文原文,以便读者把我们译介的关键词语放回英文语境中阅读,进一步体会这些词语和概念在翻译中可能遗漏的含义。阅读此篇原文,也将有助于加深理解本译文集各位作者对“男性特质”概念的讨论。同时,我们在附录中列出本译文集涉及的英文关键词,欢迎读者和我们商讨这些词语的翻译。附录中还包括了文集中涉及的主要英文作者英汉姓名,便于感兴趣的读者寻找这些作者的英文著作。

本译文集部分内容是复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举办的社会性别博士课程班的阅读材料。本译文集的翻译和出版费用获得美国路斯基金会的资助,特此鸣谢。

最后,作为本译文集的主编,我们衷心感谢参加翻译的学者。他们以对介绍新学术领域的一片热诚接受、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难度很高的翻译工作。译文中若还有错误,是负责译文校对的主编的疏漏,敬请读者指正。

张颖 王政

2009年春节初稿于密西根大学

2010年12月定稿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琼·W.斯科特(Joan W. Scott) (3)

霸权男性特质：针对此概念的再思考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R. W. 康瑞文 詹姆士·梅瑟施密特

(R. W. Connell and James W. Messerschmidt) (35)

从“霸权男性特质”到“男人的霸权”

From Hegemonic Masculinity to the Hegemony of Men

杰夫·荷恩(Jeff Hearn) (80)

新男性史与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缺失的奇特现象：早期美国社会

性别史的几点启示

男性研究

- The New Men's History and the Peculiar Absence of Gendered Power:
Some Remedies from Early American Gender History
托比·第兹(Toby L. Ditz) (113)

第二部分

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交欲望

-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依芙·萨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159)
导言(节选)Introduction (159)
恋爱中的天鹅: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分析
Swan in Love: The Example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182)

如何书写男同性恋历史

- How to Do the History of Male Homosexuality
大卫·霍尔朴林(David M. Halperin) (212)

对被模仿者的模仿:“女形”的社会性别——其历史性、操演性
及其在女性特质传播中的参与

- The Gender of Onnagata As the Imitating Imitated: Its Historicity,
Performativity, and Involvement in the Circulation of Femininity
依坂真纪(Maki Morinaga) (253)

给男性特质一个历史:殖民地时期印度历史研究的贡献

- Giving Masculinity a History: Som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

目 录

- 马里娜力·辛哈(Mrinalini Sinha) (292)
- 用种族和“文明”重塑男人身份
Remaking Manhood Through Race and “Civilization”
盖儿·比德曼(Gail Bederman) (314)
- 在阿布格莱布塑造男性特质:一个美国军事丑闻的女权主义解读
Wielding Masculinity Inside Abu Ghraib: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an
American Military Scandal
辛西亚·恩露(Cynthia Enloe) (375)

附 录

- Masculinities(原文节选:第三章) R. W. Connell (391)
- 汉译英文关键词简表 (419)
- 主要英文作者译名一览 (422)